

求 索 中 国

— “文革”前十年史（上）

肖冬连 谢春涛 著
朱 地 乔继宁

红 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肖冬连等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9

ISBN 7-5051-0383-0

I. 求…

II. 肖…

III. 中国—现代史—1956~1966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772 号

求索中国

——“文革”前十年史

肖冬连 谢春涛 朱 地 乔继宁 著

责任编辑 王农媛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话:编辑部:64037149

出版部:64016970

发行部:64037154

(邮政编码:100727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8.5

字数: 900 千 印数: 1—15000 套 (上、下册)

ISBN 7-5051-0383-0/K·17

定价: 58.00 元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新路初探	(1)
1.1 批判右倾 城乡发动改造高潮 敲锣打鼓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
1.2 大略宏图 毛泽东倡导多快好省 进军科学 周恩来广纳知识人才.....	(20)
1.3 批斯大林 赫氏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一喜一惧 毛公以苏为鉴探寻新路.....	(37)
1.4 鼓励争鸣 毛泽东推动“百花运动” 反对冒进 周恩来主张稳步前进.....	(53)
1.5 集思广益 八大确立建设方略 广会宾朋 中共领袖直抒胸臆.....	(72)
1.6 波匈动荡 苏共集团初乱章法 克乱劝和 中共首脑两赴苏联	(106)
第二章 沉重一页	(122)
2.1 纵观天下 毛泽东阐发“正处”宏论 应时而动 各阶层讨论内部矛盾	(122)
2.2 未雨绸缪 共产党号召开门整风 千呼万唤 各党派坦陈逆耳忠言	(147)

2.3	言路一开	大鸣大放舆论越轨	
	风声渐紧	主席判定黑云压城	(182)
2.4	主题突变	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深入挖掘	反击扩大后果惨重	(219)
第三章	“春潮”涌动		(241)
3.1	反右过后	主席迁怒反冒进	
	三中全会	酝酿发动大跃进	(241)
3.2	莫城盛会	毛泽东出语惊世界	
	东风劲吹	中苏间攀比赶英美	(253)
3.3	南宁会议	批反冒进空气凝重	
	成都会议	破除迷信信马由缰	(276)
3.4	辩论开路	农村跃进紧锣密鼓	
	指标竞赛	改变面貌指日可待	(302)
3.5	五月大会	大跃进运动强行发动	
	违心检讨	周恩来陈云处境艰难	(325)
第四章	跃进狂澜		(345)
4.1	竞放卫星	浮夸风吹遍神州	
	大公社	乌托邦走进中国	(345)
4.2	北戴河会	钢铁翻番全党动员	
	公社决议	共产主义指日期成	(366)
4.3	大炼钢铁	九千万人上阵奋战	
	砍树砸锅	伤财劳民后果严重	(382)
4.4	一轰而起	人民公社一月建成	
	两县争先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397)
4.5	中苏裂痕	毛公怒拒联合舰队	
	中美对抗	赫氏狐疑炮击金门	(418)

第五章 郑州纠左	(435)
5.1 郑州会议 两个界限必须划清		
武昌会议 高指标要压缩空气	(435)
5.2 再会武昌 纠超阶段革命空想		
二上郑州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454)
5.3 旧账要算 不算难以教育干部		
学习海瑞 要有坚持真理勇气	(467)
5.4 压低指标 指标高了反而泄气		
纠“左”有成 可惜局限不能彻底	(475)
第六章 庐山风云	(495)
6.1 同登庐山 毛彭二人心境各异		
“神仙”开会 估量形势意见分歧	(495)
6.2 元帅上书 建议“纠左”更进一步		
闻天发言 痛陈得失犯难直言	(508)
6.3 风云突变 毛泽东发愤激之情		
急转直下 揭发批判对事对人	(525)
6.4 召开全会 猛追逼军事俱乐部		
通过决议 彭黄张周蒙受冤屈	(541)
6.5 齐下庐山 彭黄张周又遭批判		
大反右倾 “左”倾灾祸雪上加霜	(559)
6.6 热衷缓和 尼基塔暗责毛公“好斗”		
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指赫氏“右倾”	(576)

第一章 新路初探

1.1 批判右倾 城乡发动改造高潮 敲锣打鼓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盛大的节日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

1956年1月，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是一次历史性的盛大节日，它给人们带来的喜悦和憧憬，不亚于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那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震撼了亿万中国人的心。1956年初，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节日狂欢，从北京开始，迅速扩散到上海、天津、西安……一直蔓延到全国。

首都北京是第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北京郊区农民首先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人们争先恐后，要求入社，所有的初级社都要求转为高级社，一个多月时间里，北京郊区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资本家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公私合营。仅1956年1月8、9、

10日三天内，就全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一大批资本家中的积极分子，不仅拱手交出了自己的企业，还纷纷把自己的房产、现金、贵重药材、工业原料、牲畜、大车以及过去埋在地下的金银等账外财产一齐拿出来，投入企业。资本家们“家家挂红庆合营，锣鼓喧天鞭炮鸣，游行献旗感恩惠，彻夜狂欢天安门”。

紧接着，1月11日和12日两天，社会主义的潮流就把所有手工工业工匠们裹了进来。

连日来，首都北京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庆祝活动到1月15日达到最高潮。这天，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当天《人民日报》记者记载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连日来，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北京市人民，今天，以更高的热忱投入到节日的狂欢里。许多人穿起新年的盛装，许多人举起参加国庆节的红旗，他们打起锣鼓，向着天安门广场来了。石景山、东郊的国营工厂的工人来了，南苑、海淀的农民来了，崇文区、宣武区的手工业者来了，前门区、西单区的工商业者来了，一切为社会主义胜利而祝贺的人都来了。一队一队的人群，好象一条一条的河流，通过田野、村庄，通过大街小巷，汇集到天安门前人群的海洋里来了。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大批新中国的领导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走进了这沸腾的人群之中。

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店员、郊区农民、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

以及工商业者的代表，纷纷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毛泽东满心喜悦，用他那宽厚的双手，亲自接过了一封封用硕大的红色信封装着的报喜信。

郊区农民的报喜信说：

自从您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郊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入社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级社都积极要求变为高级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郊区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从此，我们郊区全体农民永远脱离了小农经济的苦海，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这条幸福、康庄的大道。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报喜信说：

我们听到政府按行业批准所有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入社的消息，喜欢得跳了起来，互相道喜。在 11、12 日两天里，共有 53882 人被批准入社，现在我们新、老社员已经有 89000 多人了。

工商业者的报喜信说：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于本月 10 日胜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营，向着社会主义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要逐步地放弃剥削，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后参加到光荣的工人阶级行列中去。

最后，北京市长彭真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庆祝郊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随着彭真市长的宣布，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人们欢呼，人们跳跃，欢呼声像海洋、像风暴，响彻了全场。人们用欢呼向自己的领袖毛主席表示深切的感谢。

北京是全国的缩影。继北京之后，天津、上海、西安、沈阳、南京、重庆、广州等 118 个大中城市，先后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了。

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市，也于 1 月 20 日，全市全部批准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从 1955 年 9 月起，上海就开始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势头，11 月中华全国工商联会议后，迅速掀起高潮。到处可见“庆祝批准公私合营”的大红横幅和金黄色的大“囍”字。到处是工人和资本家们组织的报喜队，到处看到有工商商店张灯结彩，举行庆祝仪式。全国著名的上海宝大祥绸布店，资方拿出现款 3 万元作为公私合营准备金；上海私营百达棉织厂的老板，把家中私

藏的 420 两黄金卖给国家，投入企业生产。

1956 年 1 月 20 日，这种热烈喜庆气氛达到高潮。记者报道：

1 月 20 日，灯火辉煌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里举行着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会场像办大喜事一样，悬挂着红色霓灯的大喜字，周围挂着红幔。参加大会的资本家代表和家属们，个个穿着华丽的节日礼服，胸前佩挂红花，脸上掩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欢悦。……

会议从一开始就淹没在连续不断的鼓掌声、欢呼声中，人们几十次地站起来，上百遍地重复地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到了宣布自由发言的时候，扩音机旁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私营工厂的厂长、小商店的主人、资本家的妻子、私营工厂的工人。有的是满头白发，有的只有二十多岁。

1 月 21 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这些人，但在人们心理上，似乎一夜之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切丑恶的根源已抛给了过去，一切美好的希望就在眼前，劳动者们庆祝挖掉了私有制这个“穷根”，走出了小生产的“苦海”，相信已走上了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资本家们庆幸自己将摆脱那讨厌的剥削者的恶名，加入到神圣的工人阶级行列之中。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幻想的年代！

谁是第一推动力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他认为宇宙是在外来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下由静止开始运动的。谁给予了那神秘的“最初一推”呢？他归结为上帝。

上帝是没有的。毛泽东才是中国这场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总是运动加速的动力源。

高潮从农业开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并不是所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 1955 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三个会议”就是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 15 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 月 31 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 10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从 1953 年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到 1955 年上半年，农业改造都还是按照 15 年完成合作化的步骤进行的。然而，到了 1955 年夏季，毛泽东改变了部署，决定加快改造步伐。毛泽东所以要加快，自有他的考虑。一方面，他对农民中的“自发倾向”和可能的两极分化的后果极为担忧，一方面他相信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还相信加快农业合作化是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化矛盾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加快改造的决策更深层的冲动来自于他对创造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渴望。“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10月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所谓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他批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经过这两个会，尤其七届六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农村基层，都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形势急剧变化，合作化高潮出现了。各地各级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社比单干确实增产的优越性的典型材料，像雪片似地送进了中南海。总共有1000多份。

毛泽东面对这一大批材料，面对全国的高潮，兴奋不已，为了推动高潮的进一步发展，他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并写了104条按语和两个序言。

在那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上了。他吩咐李银桥说：“这两个月有什么事，不要叫人再找我了。我要专心搞合作化呢，不会客。”

李银桥回忆说：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材料一摞一摞的，都是八开大的清样纸，别的什么文件也不放。他整天呆在屋里，夜里写，白天上午写。下午偶尔睡几小时，起来又干。一连十几天他没同我说话，给他送茶也不看你一眼。他身体的疲劳与精神上的兴奋同样明显。他在追求心中的目标时总是这样一种表现。

暑天到了，中央统一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我向毛

泽东报告，毛泽东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他在讲这些话时，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一种孩子般天真烂漫又是扑朔迷离的神情。好像在他的面前施了魔法似的，忽然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美妙无比的世界，他在向那种神秘诱人的未来倾诉着悄悄话。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我这样说你理解吗？

在北戴河，毛泽东仍心潮澎湃，挥笔如飞。一天，台风乍起，一时间狂风大作，大海咆哮，雷电交加。毛泽东突然把笔掼在桌上，奋然起身，说：“银桥，我们游泳去。”

“啊？！”这一举动吓坏了李银桥，赶快报告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长，负责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的保安工作。罗下令：“一天 24 小时，你们一分一秒也不许离开主席。要看紧，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保护他，决不许他下海。”

台风终于过去，天开云散。毛泽东又要去游泳，再也拦不住了。然而，海面仍有七级大风。刚下海，一阵海浪卷来，把所有人都拍倒在海滩。毛泽东站起来，吐出嘴里的泥沙，睥睨着大海，说：“嘿，还真是个对手呢。”毛泽东已把大海视为对立面，非要征服它不可。一次次冲进大海，又一次次被海浪抛起，扔向沙滩，但毛泽东终于“征服”了对手。

“那天游泳回来，毛泽东比当年打下沙家店还要显得高兴。”李银桥说。

毛泽东以挑战的姿态面对着大海，以亢奋的心情呼唤着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不无得意地

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给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意思是说，他说高潮已经到来，是有根据的，是经过调查的。然而这一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并不是亲历亲为，实地考察，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

逄先知这样说：

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的调查，并为我们全党作出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加写在各地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语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当时的党政各级组织，行政效率很高，有一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热情很高的纪律性极强的干部队伍，有从土改中形成的一批农村积极分子，一声令下，雷厉风行，往往是争先恐后，超额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这样，在上面的号召和压力下，基层也获得了运动不断加快的动力。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和本地生长起来的积极分子们，走家串户，说服动员、典型示范、晓以利益，把

农户引进合作社。强制和压力是存在的，但决没有如苏联 30 年代集体化时期那种普遍的暴力。

中共与苏共不同，在农民中有深厚的根基，新中国的各级干部绝大多数不过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中，又形成了农村积极分子队伍，农民对共产党有着强烈的向心力和感恩戴德思想。中国农村地主被打倒后，富农的力量极其微弱，构不成反对力量，经过发动群众斗地主，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以富为耻、以贫为荣的观念。土改后得到土地的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的观念并不普遍，更多的人是怕冒尖。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对于那些占人口 70% 以上的贫农来说，人社不会失去什么，而且指望能得到什么。在当时，许多人相信，合作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产量，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而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朦胧的但又是热烈的憧憬。从 1951 年 12 月党的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作出以后，农业互助合作事业总的说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初级社时期，多数合作社确实增加了产量，这是在保护农民小私有制的前提下，集中使用有限生产资料和简单协作的效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国家在技术、投资、贷款等方面优惠待遇。这在当时合作社占农户比例很小的情况下，并不难做到，这种示范，对农民确有相当的吸引力。这，或许就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吧，更确切地说，这就是高潮所以掀起又没有遇到严重阻力的社会历史条件。

造成资本家非接受改造不可的形势

相对于对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走向合作化心中无

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毛泽东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两只脚，已经有一只半踩进了社会主义。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导致国内市场的大改组，私营商业基本被挤出批发环节，掐断了私营工商业与农业在流通环节上的联系，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政策。1954年底由于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导致把所有私营工商业（包括未公私合营的）纳入计划轨道。就使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似乎成了必要途径。

当然，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是受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毛泽东采取了“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两面夹击”，一是用农业合作化来促工商业改造，一是用私人企业的工人来促资本家。“网开一面”，就是实行和平赎买，安排资本家及其子女的工作，给予政治上的待遇。毛泽东在推动合作化高潮之时，就充分地估计到它对工商业改造的重大促进作用。1955年10月9日，他在审阅彭真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篇发言稿时，加了一段话：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资本家坐不住了，他们受到的压力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工人和农民的“两面夹击”，甚至来自于自己家里要求进步、急切想摆脱剥削家庭的子女。资本家惶惶然，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泽东洞悉资本家们的心态，他决定再推一把。10月27日、29日，他两次邀约大资本家及其头面人物到中南海颐年堂和怀仁堂，举行座谈。被邀的有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以及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毛泽东作了两次谈话，给他们“指点迷津”。他说：处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私有制要变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了解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

毛泽东说：“现在我知道，你们思想上有顾虑，现在大家都搞社会主义，你们不搞，你们心中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你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听了毛泽东的话，工商巨子李烛尘跃跃欲试，他说：“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改造高潮”。

毛泽东说：“不要搞一阵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从中南海出来，工商界巨子们认清了大势，也看到了自己的归宿。11月2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对资改造问题。陈云传达了上述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两次重要讲话，提出了全面改造的六点规划，核心是全国统筹规划，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毛泽东等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对资改造的决议（草案）。

会上关注的中心不是要不要全面改造，而是改造后如何对待